

字书字料库视域下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的构建

丁 明, 郑瑶瑶

(渤海大学 文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摘要:长期以来,汉字简化方法一直是繁简字研究领域的重点内容之一,但目前仍存在名称各异、层次混乱、界限不严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繁简字的研究,对字书字料库字段的设置以及繁简关系属性的标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文章在遵循分类依据及分类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字书字料库的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以弥补简化方法理论的不足,并为字书字料库的建设及繁简字的标注等后续工作奠定基础。

关键词:字书字料库;繁简关系;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

中图分类号:H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3)04-0061-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3.04.010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CFDDt

DING Ming, ZHENG Yao-y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simplification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s been one of the focuses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traditional and simple character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different names, chaotic levels, and lax boundaries, which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field setting of the CCFDDt and the attribute a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simple character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basis and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simplification methods applicable to the CCFDDt,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theory of simplification methods, and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CFDDt and the a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simple character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Form Database of Dictionary (CCFDDt); the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the simplification method of Chinese character; classification system

20 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学科与计算机科学相互交融的势头逐渐强劲,汉字学领域亦不例外,作为新兴汉字学

研究工具的字书字料库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字段的设置是字书字料库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在设置字段时,不论是进行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AYY01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296);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21CYY002);渤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YJC2022-012)

作者简介:丁明(1997—),男,满族,辽宁绥中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字学;

郑瑶瑶(1998—),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字学。

部分类,还是设定各个分类之间的层次关系,都要做到既不违背学界共识,又要在传统观点的基础上适当创新,以满足汉字信息处理的需要。汉字简化方法是字书字料库的核心字段之一,构建出一套适用于字书字料库标注的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尤为重要。

所谓汉字简化方法,是指汉字简化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手段。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法定字表——《第一批简体字表》,对汉字简化方法的讨论也由此展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开展汉字简化运动,相继颁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等一系列法定汉字简化方案,此后有关汉字简化方法的研究一直未曾间断。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当下在对汉字简化方法的分类中还存在着名称各异、层次混乱、界限不严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繁简字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且对基于字书字料库的相关研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以CCFD字书字料库(4.0版本)作为研究平台,以汉字简化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在传统汉字简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学界前沿的理论方法,构建一套适用于字书字料库的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拟为今后相关研究及字书字料库的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帮助。

一、传统汉字简化思想及存在的问题

汉字简化古已有之。古人虽然很早注意到汉字形体的繁简之别,但对于繁体转化为简体的方法却没有过多的总结和交代。直到近代汉字改革运动兴起,使繁简字的定义逐渐清晰,汉字简化方法才被明确提出并系统地概括出来,有关汉字简化方法的相关思想也相应产生。虽然相关成果十分丰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对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的构建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一)传统汉字简化思想

1. 钱玄同的汉字简化思想

在众多汉字简化思想中,最具代表性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便是钱玄同的汉字简化思想。

1923年,钱玄同在《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一文中,通过综合分析宋元时代流传下来的简体字,首次提出了汉字个体简化方法,并将其总结为八种基本类型^[1]:保留原字轮廓,如将“壽”简写作“寿”;采用原字的草书形体,如将“為”简写作“为”;只保留原字的部分形体,如将“聲”简写作“声”;将原字笔画多的部分用简单写法替换,如将“劉”简写作“刘”;采用原字的古体,如将“從”简写作“从”;用笔画少的字替代原字声符,如将“燈”简写作“灯”;另造一个简体替代原字,如将“響”简写作“响”;假借其他形体简单之字以代原字,如将“義”简写作“义”。

此外,钱玄同还对汉字类推简化方法进行了较早的探索。1934年,钱玄同在《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中对此方法进行了系统概述,他指出:“但要普及简体字,先规定简体字的写法……有了标准体,便可用其偏旁而为新的配合。这一配合,简体字便多多的增加了。”^[2]由此可知,钱玄同意识到汉字偏旁是成系统存在的,如果能确定一个标准体,且恰好该标准体还可作为偏旁使用,那么便可实现汉字成系统的简化了。此后,在钱玄同主持拟定的民国《第一批简体字表》中,此类推思想也有所体现。例如将“義”简化为“义”,那么“儀”“蟻”则分别简化为“仪”“蚁”;将“門”简化为“门”,那么“們”“悶”便分别简化为“们”“闷”。

钱玄同汉字简化思想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孙建伟所说:“钱玄同是归纳汉字简化方法的先行者,自他之后,民国学者在探究汉字简化问题时,或完整转录钱氏的结论,或在分类和举例等方面,与钱氏有较大相似性。”^[3]所言不虚,钱玄同总结的汉字简化方法以及相关思想对于民国时期乃至现代的相关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他是名副其实的汉字简化方法研究第一人。

2. 现代学者的汉字简化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法定字表相继颁布,简化字的地位日益提高。由此,有关汉字简化方法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黄伯荣^[4]将汉字简化方法总结为三大类:一是繁体字减去一部分,即繁体字通过减省一部分笔画实现简化;二是繁体字整体简化,这种方法包括用笔画简单的字替代繁体字,也包括用同音且笔画简单的字替代繁体字;三是繁体字部分简化,这种简化方法主要包括类推简化以及用简写的字或符号替代繁体字两种。蒋善国^[5]将之概括为七类:另造新字、采用轮廓或部分代替整体、改变偏旁(其中包括省去或减少偏旁、改变偏旁笔画、改换偏旁、用符号或单字代替偏旁四种)、同音代替、恢复古体、楷化草书、简化偏旁。黎传绪^[6]将之概括为四大类:简化原字、简化偏旁、废除今字保留古字、合并同音字。苏培成^[7]将之总结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省略,包括省一边、省两边、省一角、省内外以及其他五小类;第二类是改形,包括改形声字、改会意字、轮廓化、符号代替四小类;第三类是同音或近音代替。张桂光^[8]将之概括为九类:用古字、草书楷化、局部代替整体、用象征性符号代替、改换声旁、改换形旁、同时改换形旁和声旁、新造会意字、合并同音字。

从以上成果可以看出,现代学者对于简化方法的划分主要以钱玄同的汉字简化方法为基础,并对其方法进一步地分并、扩展。概括而言,现代学者关于汉字简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向:删,即删除原字形体中的一部分笔画或构件;改,即改换原字中形体繁琐的某些部分;代,即选用形体简单的字或符号替代原字;并,即将几个字的功能合并至一个字内。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钱玄同的理论体系,也进一步扩展了汉字简化方法的理论范畴。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现有关于汉字简化方法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名称各异

名称各异是指对于同一种汉字简化方法不同学者所给出的名称不同。以“同音替代”为例,不同学者在指称此种简化方法时,往往也采用“合并同音字”或“同音字代替”等不同的术

语。虽然各学者的研究背景及知识结构不同,拟定这些术语名称时常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术语不统一往往会导致概念模糊,以致影响理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正如陆宗达等所言:“术语必须有明确的定义来确定它的内涵、外延,术语还应当是统一的、固定的、意义单一的。”^[9]由此,将汉字简化方法术语名称进行统一是很有必要的。

2. 层次混乱

层次混乱是指各个简化方法的层级系统不清晰、上下层级的逻辑联系不严密。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将类推简化与草书楷化、同音替代等个体简化视为并列关系。但实际上,类推简化与个体简化属于同一层级,而草书楷化、同音替代等则是个体简化的下一级简化方法。因此,将草书楷化、同音替代等本应从属于个体简化的小类与类推简化这一大类并列在一个层级上使用是存在问题的。此外,现在大多数研究在汉字简化方法隶属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各行其是的情况,未将各方法上下层级的逻辑关系划分明晰。

3. 界限不严

界限不严是指简化方法之间由于缺少明确的判定原则,在判定同一个汉字的简化方法时可能会出现两可的情况。例如“從”简化作“从”,可以算是恢复古体字,这源于“從”字的甲骨文形体常作“𠂔”(《合》20975)、“𠂔”(《合》21355)等形,也可以算是省略构件“辵”得到的。另外,很多学者在总结汉字简化方法时,喜欢将“恢复古字”或“保留古体”纳入其中,但却没有对何为“古字”或“古体”进行具体的说明,究竟是指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系统中的文字,还是只要是出现在古代字书辞典或语篇文献中的单字都可以称为“古字”或“古体”,对此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上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由简化方法判定原则界限不严导致的。

二、汉字简化方法分类的依据及原则

在处理汉字简化方法的分类问题时,既要符合汉字学的基本理论,也要尽可能地满足字书字料库标注的基本需求;既要解决上述列举

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制定更加科学的分类依据和原则。

(一)分类依据

1. 汉字构形学理论

汉字构形学主要探讨的是“汉字的形体依一定的理据构成和演变的规律”^[10]。汉字构形学理论视角下,汉字的书写和构形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笔画是汉字书写系统中的最小单位,而构件则是汉字构形系统中的最小单位。现有的汉字简化方法对于汉字形体结构变化的概述还基本局限在汉字的书写层面。本文试将“构件”这一基本单位引入构建的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中,这正是以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的结果。

2. 字料库汉字学理论

字料库汉字学是一门以汉字学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以字料库作为研究工具的交叉学科^[11]。利用字料库在存储、统计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可以在验证传统汉字学观点的同时,实现理论方法的创新和发展。本文所讨论的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是以字书字料库为研究基础和实践平台展开的,构建的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也将运用至字书字料库繁简关系体系以及汉字简化方法字段的设置中。因此,字料库汉字学理论是本文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理论来源。

(二)分类原则

1. 穷尽性原则

所谓穷尽性,是指构建的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能够涵盖所有需要标注的字料,理论上不存在遗漏字头的情况。要在分类上实现穷尽性,就必须综合考量所有标注对象。当遇到比较特殊的个例时,需要及时调整和改动分类标准,以确保每个字头都能有与其相对应的汉字简化方法。是否可以将现有的字料全部归纳至此体系中,也是核验此体系是否科学、全面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严密性原则

严密性原则是针对分类标准而言的。现有简化方法界限不严的问题在理论的归纳和建构阶段可能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但一旦进入字

料库的建设和标注环节,便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数据统计结果的失效。因此,在前期的理论构建上必须遵循严密性原则,确保字段间以及字段内诸选项间都存在能够区别彼此的核心要素,由此来保证后期字料库建设与繁简字标注工作的顺利开展。

3. 通用性原则

所谓通用性,是指本文所讨论的汉字简化方法的分类标准不仅适用于 CCFD 字书字料库的建设及标注,而且对于其他字料库的建设仍然是有用的。因此,通用性原则要求在确定简化方法时,不仅要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的,而且还要对其他字料库的建设以及汉字学的研究有所帮助。

三、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的阐释与分析

汉字简化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如图 1 所示),即类推简化和个体简化,本文将这两种方法作为简化方法的第一级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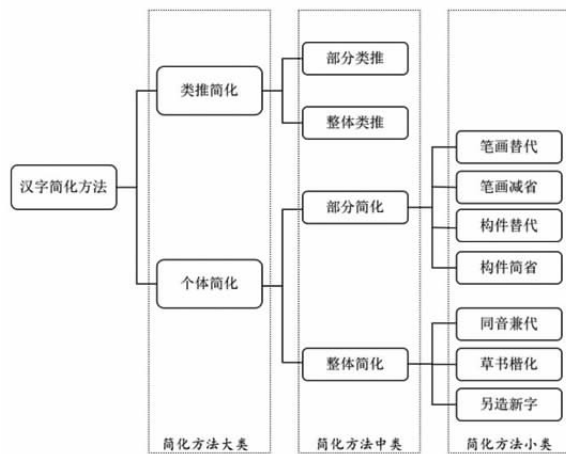


图 1 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

(一)类推简化

传统思想中的类推简化方法常常与其他个体简化方法的小类并列在同一层级,层次关系不分明,且内部也未作更为详细的划分。本文将类推简化作为简化方法的大类与个体简化并列,且进一步将类推简化划分为部分类推和整体类推两类。

1. 部分类推

所谓部分类推,是指一个汉字中的多个构件都存在繁体写法,但简化时只对其中的部分构件进行了简化,简化完成的汉字仍然有繁体写法构件的存在。部分类推是类推简化中的一个小类,部分类推字在《汉语大字典》《汉字海》等大型字典辞书的类推简化字中比较常见。例如《汉字海》中,“鷄”的类推简化字为“鸡”,在组成“鷄”的两个基础构件中,只有“鳥”完成了简化,作“鸟”,而“亞”依旧是繁体形式。这种简化得不够“彻底”的类推便是部分类推。

2. 整体类推

大部分类推简化字由整体类推而得,比照部分类推的定义,整体类推是指简化时对一个汉字中多个繁体写法的构件全部实现简体写法的替换。整体类推例子较多,例如,“馬”简化为“马”,“區”简化为“区”,那么由以上两个繁体构件组成的“驅”便简化为“驱”。

(二) 个体简化

本文将个体简化分为部分简化和整体简化两类。部分简化着眼于汉字的局部,简化时只有汉字的部分形体发生变化,其余部分则保持不变,包括笔画替代、笔画减省、构件替代和构件简省四种简化方法小类。整体简化着眼于汉字整体,简化时汉字的整体结构都会发生变化,包括同音兼代、草书楷化和另造新字三种简化方法小类。

1. 部分简化

(1) 笔画替代

笔画替代是指用汉字的基本书写笔画去替代汉字中较为繁琐的部分。此方法的判定原则为:被替代的部分既可以是笔画,也可以是构件;而用来替代的部分一定是笔画,不能是构件。例如“辦—办”。辦,《说文·新附》:“辦,致力也。从力,辵声。”辵,《汉语大字典·辛部》:“《广韵》:‘符蹇切。’”随着语音的发展,示音构件“辵”的示音功能逐渐减弱,且此字不常用,故在汉字简化时,将二“辛”分别以“丿”“㇏”两笔画替代。

(2) 笔画减省

笔画减省是指通过省略汉字形体中的单个

或多个笔画来实现汉字的简化。利用笔画减省实现汉字简化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较为普遍。如“舟”和“耳”是《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规定的简化字,其中,“舟”是由“舟”字省去两点得到的,“耳”是由“耳”字省略两横得到的,它们都是笔画减省的结果。

(3) 构件替代

构件替代是指用结构和写法较为简单的构件去替代结构和写法相对繁琐的构件。构件替代有三种类型:记号构件替代、示音构件替代以及表义构件替代。

例如“鷄—鸡”。鷄,《说文·隹部》:“知时畜也。从隹,奚声。”汉字简化时,将“鷄”中原有的示音构件“奚”替换为形体相对简单的构件“又”,“又”在此处只是记号。此为记号构件替代例。

例如“趕—赶”。赶,《正字通·走部》:“赶,追逐也。”汉字简化时,采用了“趕”的俗体字“赶”。由此,“趕”的简化便是将构件“旱”替换成现代读音更加接近且形体也更为简单的“干”。简化后,“干”亦为示音构件。此为示音构件替代例。

例如“隊—队”。隊,《玉篇·阜部》:“隊,部也,百人也。”其中,“豕”为示音构件。汉字简化时,将示音构件“豕”替换为表义构件“人”,以增强其作为“集体单位”的意义。此为表义构件替代例。

(4) 构件简省

构件简省指的是通过省略繁体字一部分构件或构件中的一部分下级构件来实现汉字的简化。省略的部分可以是直接构件,也可以是基础构件;可以是表义构件,也可以是示音构件。

例如“慮—虑”。“慮”字中,“虍”既是直接构件,也是基础构件。“思”也是直接构件,其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基础构件,即“田”和“心”。从构件的功能上看,“虍”是示音构件,“思”是表义构件。汉字简化时,可以说是将“慮”中的表义构件“思”省略掉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将“慮”的基础构件“田”省略了,由此得到简化字“虑”。

再如“壘—垒”。“壘”字中,“貍”为直接构

件,亦可划分为两个基础构件,即“豸”和“艮”。“土”既是直接构件,也是基础构件。从构件功能上看,“豸”是示音构件,而“土”是表义构件。汉字简化时,可以说通过省略繁体字“壘”示音构件“豸”中的一部分实现了简化,也可以说通过省略“壘”的基础构件“豸”实现了简化,从而得到简化字“垦”。

2. 整体简化

(1) 同音兼代

同音兼代是指借用声音相同或相近且形体和结构相对简单的字兼并替代形体和结构相对复杂的字。之所以采用“同音兼代”的名称,是因为此种简化方法是由两个步骤组成的:一是兼并,二是替代。例如“穀一谷”。谷,本义为山谷。《说文·谷部》:“谷,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出于口。”穀,本义为百谷总名。《说文·禾部》:“穀,续也,百穀之總名。”汉字简化时,“穀”“谷”二字读音相同,于是将“谷”作为简化字替代“穀”,此种简化便是使用了同音兼代的简化方法。在形体结构方面,“谷”字形体保留,替代“穀”;在使用功能方面,“谷”字保留不变,“穀”的音义关系归并至“谷”字中。从中可以看出,在“穀”简化为“谷”的过程中完成了上述两个基本步骤。

(2) 草书楷化

将历代书法作品中的草书字以楷书的笔形描摹下来以达到简化目的的方法便是草书楷化,草书楷化实质上是两种字体间的转化。使用这种简化方法只是对汉字书写属性和构形属性进行调整,并不改变汉字记音表义的功能。例如“實一实”。實,《说文·宀部》:“富也。从宀,从贯。”本义即为富有,其草书作“𡩂”(东晋王羲之)、“𡩂”(唐张旭)等形。汉字简化时,从形体结构上看,构件“宀”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构件“贯”连写后与“头”字形体相仿,便楷定作“头”,最后得到楷化后的简化字“实”。

(3) 另造新字

所谓另造新字,是指在汉字简化过程中重新创造一个形体结构相对简单的字,以替代原有较为繁琐的字。简化前后的两个字造字理据

虽然不同,但新产生的简化字的构意依然能够与原有繁体字保持高度契合。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整体简化下的另造新字一定是字的所有构件都发生了变化,如果仅仅是部分构件发生变化,则不属于此小类。

例如“護一护”。護,《说文·言部》:“護,救视也。从言,萑声。”萑,《汉语大字典·艸部》:“《集韵》:‘胡陌切。又郁缚切。’”随着语音的演变,构件“萑”的示音功能已经逐渐丧失,且随着语义的发展,“保护”“偏袒”“救助”等成为“護”的主要义项。由此,汉字简化时,另造新字“护”,从手户声,形体结构都相对简单,且更能贴合当今此字使用的读音和释义。

四、结语

本文以字书字料库繁简关系界面作为研究的基础,构建了一套符合汉字学基本原理且适用于字书字料库标注的汉字简化方法分类体系。此分类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体系的不足。首先,在现有分类方法基础上确定了各个汉字简化方法的名称,使汉字简化方法的名称得到了统一;其次,将汉字简化方法分为三个层级(类推简化分为两级),共大、中、小三类,进一步厘清了汉字简化方法的各个级别;最后,给出了每个汉字简化方法的定义,并对各方法的判定原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界限不严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钱玄同. 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M]//钱玄同. 钱玄同文集:第3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85-92.
- [2] 钱玄同. 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M]//钱玄同. 钱玄同文集:第3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71-472.
- [3] 孙建伟. 钱玄同对汉字简化的理论阐述及实践推进[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3(3):96-103.
- [4] 黄伯荣. 简体字的结构[M]//《中国语文》杂志社. 简化汉字问题. 北京:中华书局,1956:46-51.

(下转第 79 页)

并跟随他深入莽古斯大漠,找到《孛音·毕其格》真迹并潜心钻研传统文化的精髓。最终白尔泰领悟了万物有灵、万物相系、万物皆神圣的重要思想。

《银狐》最终展现了人兽相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结局。这种完美的结局在郭雪波的小说中独树一帜,既寄托了他内心真实的愿望,也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念。同时,小说结尾在思想上进一步升华,构建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境界,使故事内容自然收束。珊梅、白尔泰和铁木洛都追随银狐去了黑土城,此举可以看作是他们摆脱烦扰与折磨,追求灵魂安宁的方式。珊梅被恶毒的村长胡大伦诱奸怀孕,回村也难免遭人白眼、被丈夫嫌弃。她义无反顾地追随银狐是将自己从村人的折磨中拯救出来,实现精神的安宁。白尔泰经历了大城市的喧哗和小村庄的骚动,唯独到莽古斯大漠中的黑土城看到《孛音·毕其格》真迹后,浮躁的心灵才沉静下来。铁木洛来到黑土城后,则可以摆脱村里三大家族的争斗,在黑土城山脚下专心地种植耕耘,获得身心的自由和放松。

小说中的白尔泰对自然万物的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直接代表了郭雪波构建和谐共存的生态家园的美好愿景,也促使读者对当下的生态困境进行思考并积极回溯传统文化。“从自然的‘沙狐’到传统文化符号的‘银狐’,这是郭雪波个人文化理念的升级,并非简单的宗教理念宣扬,而是希望人们借此树立神圣的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古老理念。”^[11]这是郭雪波在近30年的文学创作中始终想表达的

主旨,即从传统文化中探寻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出路。

参考文献:

- [1] 韩伟,赵仁娟.人性的拷问与理想的憧憬:评长篇小说《银狐》[J].小说评论,2010(3):124-128.
- [2] 李晓梅.论郭雪波草原小说的生态伦理观[J].当代作家评,2016(2):111-116.
- [3] 陈佳冀.动物叙事、族性声音与文化记忆:论乌热尔图小说民族文化书写的叙事建构[J].中国文艺评论,2021(11):57-68.
- [4] 吴秀明,陈力君.从《狼图腾》看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J].文艺研究,2009(4):25-29.
- [5] 陈佳冀,熊瑶结.人性、动物性与乡土中国的想象:莫言小说中的“动物叙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76-183.
- [6] 郭雪波.银狐[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
- [7]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04.
- [8] 李建军.哀矜的仁者与务实的改革者:论田福军[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6):131-146.
- [9] 弗朗西斯·奥戈尔曼.忧虑:一段文学与文化史[M].张雪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72.
- [10] 王保畚.生态城市建设中的人文生态[J].学习与实践,2006(12):150-156.
- [11] 杨玉梅.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郭雪波访谈[N].文艺报,2010-07-05(5).

(责任编辑:李亚平)

(上接第66页)

- [5] 蒋善国.汉字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235-237.
- [6] 黎传绪.简化字问题刍议[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60-65.
- [7]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27-128.
- [8] 张桂光.汉字学简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214-216.

- [9]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8:14.
- [10] 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
- [11] 柳建钰.字书字料库的理论、实践与应用[M].北京:中华书局,2021:68.

(责任编辑:冯兆娜)